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11BGL066)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王跃梅 著

Study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王跃梅 著

Study on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 王跃梅
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308-18892-0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转
移—关系—粮食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3.6
②F32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11328 号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王跃梅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姚 嘉

文字编辑 严 莹

责任校对 张培洁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14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892-0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前 言

“以地和劳动为形式的资源禀赋,可以直接生产粮食……。就像在农业中一样……从而产生权益。或者,家庭或个体也可以另一种方式,即通过挣得工资收入来获取购买食品的能力……世界上多数人不直接生产粮食,他们通过在其他商品生产中的就业来挣得获取食品能力。……”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2002,第163页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演进,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不少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原本有“鱼米之乡”之称的粮食产区(如浙江杭嘉湖地区)已转变为粮食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是一致抑或分歧?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的协同?如何通过区域分工和功能互补实现均衡发展?如何通过“要素替代”和“要素对流”来提高粮食边际产出?怎样界定政府适当管制?”等等,这些是完成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减少农民、富裕农民的过程中所需解决和研究的公共管理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以下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4年提出“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从中包含了两个层面意思:一是粮食的生产能力(买得到),二是粮食的获得能力(买得起)。研究基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生产”和“获得”两个层面的定义,从公共管理和劳动经济学学科交叉角度出发,研究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同时实现粮食安全的协同问题。研究揭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

理;完善和补充现有的劳动力基于同质性假定的理论。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劳动力和耕地资源更为稀缺,本书旨在研究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协同,界定政府和市场行为的边界,探索产出增长与“要素替代”的新要素组合,实现区域合作和兼顾平衡,丰富劳动力流动与粮食安全理论。

第一章 导论部分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阐述了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的理论与应用价值以及研究路径的切入点,即是把“两条线”和“两个区域”结合起来研究。“两条线”研究:一条线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一条线是粮食安全问题;“两个区域”比较研究:一个区域是粮食主产区,一个区域是粮食主销区,从资源禀赋与比较利益原则出发分别考察与比较分析。研究路径上突出“两条线、两个区域”,研究把农村劳动力外流与流出地的粮食安全问题结合在一起,重点从粮食主产区、主销区视角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安全的区域影响差异,研究采用了历史梳理与逻辑分析法、分类研究与实地调查法、实证计量与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通过实证和调查分析,主要分别考察和分析“买得到”(生产能力)和“买得起”(获得能力)问题。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文献研究综述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现在文献多是两条线平行研究。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从早期的李嘉图经典理论到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拉尼斯—费景汉和乔根森的三阶段模型和托达罗概率雇用模型、舒尔茨成本—收益理论等,这些理论与刘易斯经典理论的主要分歧是,农村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存在。二是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重在宏观层面。莱斯特·布朗(1994)提出“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布朗之问”在世界范围引发了一场论战,国内外学者多视角关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认为中国劳动生产存在内卷化或过密型增长的现象。国内外文献重在研究宏观层面的粮食安全问题,分区域按照比较优势与资源禀赋的专题研究较少。三是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问题”的专题研究比较少。本研究不仅关注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国家宏观层面的粮食安全,更关注微观主体即农村家庭和个人粮食“获取能力”。

第三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农村劳动力外流演变与粮食安全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在粮食计划管理体制下(1949—1978年),农村劳动力高度性投入到粮

食生产,粮食生产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出工,工分制事先锁定了不同劳动力的不同报酬,这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磨洋工”和“搭便车”成为普遍现象,粮食生产的效率很难提高。全体劳动力集体出工掩盖了由于效率低下而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城乡分割也导致农村劳动力不可能放弃粮食生产到城市打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1978—1984年),农村劳动力投入效率提高。生产监督内部化,极大地调动了农村生产积极性,农村劳动力高效率的投入也带来了劳动的节约,部分家庭劳动力剩余出现。粮食购销“双轨制”运行,农村劳动力外流启动(1985—2000年),这些剩余家庭劳动力离开家乡另谋出路,加入城市“农民工”行列。粮食购销市场化实施(2001年至今),农村劳动力外流加速。播种面积减少影响粮食生产,尤其是主销区,比较利益驱使农民理性选择非粮产业,家庭重新自我配置劳动力,相对文化程度较高、年轻、以男性为主的相对优势劳动力,选择放弃粮食生产到城市打工,而家庭中相对教育、年龄等均不占优势的农村劳动力,留下维持承包田的劳作,俗称“386199”^①部队,他们根本没有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的愿望和能力,其劳动投入无法使粮食生产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农村劳动力结构出现失衡现象。不同区域的粮食安全目标应该根据其自然禀赋差异性有所侧重。本章节提出了分区域研究的不同目标。粮食主产区分13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粮食主销区分为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劳动力投入和外流表现有所不同,应从比较利益的视角,优化粮食生产区域布局。

第四章 粮食主产区比较优势、劳动力外流与效率安全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粮食安全一方面是指“买得到”,另一方面要能“买得起”。即有充裕的粮食生产保障,又要提高收入增强购买能力(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界定)。本章主要围绕粮食主产区“买得到”问题,即“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粮食生产保障。主产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本章通过计算主产区综合比较优势指数,主要研究主产区粮食生产比较优势,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frac{3}{4}$,结果是均大于1,而主销区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过多的劳动力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存在粮食生产过密型增长问题。主产区粮食产量增收但收入不增收。

^① “386199”即目前留守农村的主力是妇女(三八妇女节)、儿童(六一儿童节)和老人(九九重阳节)。

因此,主产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缓解了粮食生产过密化问题,实现效率安全。本章设立了模型,确立了影响粮食产出的劳动力等常规变量及非常规变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主产区产出弹性影响虽然都是显著的,但对主产区和主销区的表现程度不同,应做出不同的区域制度安排,发挥比较优势,实现粮食效率安全。

第五章 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粮食生产底线与能力安全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主销区耕地稀少,种粮产业没有比较优势,原本有“鱼米之乡”之称的主销区的粮食生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逐步弱化。主销区粮食安全目标是“口粮”自给,即有明确的粮食自给底线,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是“一致”抑或“分歧”?分析结论是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粮食产量,但增加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主销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自大量非粮生产,为粮食获得能力增强做出了贡献,显示了“一致”效应。从粮食生产的投入要素与粮食生产的灰色关联看,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固定性资本投入下降。比较利益驱使主销区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出打工”,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提高粮食主销区农户的“获得能力”。调查显示,如果种粮收入能高于打工收入,部分外流劳动力会选择回乡种粮。因此,需要有一些提高种粮收入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政策激励,以实现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的“能力安全”,实现“粮食短缺点”向“商业化点”的过渡和重合。主销区粮食安全需要在保障口粮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由部分区域间或国外进口替代。

第六章 农村劳动力外流、区域差异与粮食生产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评估和验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分工正在深化,主产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粮食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第二,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中国粮食的总体产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分区域考察情况却不同,农村劳动力外流缓解了主产区粮食生产内卷化、过密型增长现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度为19.2%,相比Lin(1992)研究时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贡献度(46.89%)下降一半以上,但在主销区已经不显著。由于比较利益驱使农村劳动力过度外流,相对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村留守劳动力对粮食产出贡献不明显。第三,务农的比较利益低下驱使劳动力外流,而且开始改变农户耕作习惯和生产决策行为,曾经是“多熟制”主销区的复种指数已经明显下降,精耕细作的

传统正在被放弃,粗放经营甚至撂荒现象日趋严重。粮食生产弱质化、兼业化、粗放化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

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目前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但从发展趋势看却潜伏着风险。一方面,工业化加速促使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外流,务农劳动力会随之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新型城市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使更多农民工举家迁移,劳动力与人口同步流动将成为现实,这对农民工无疑是好事,但却将进一步影响务农劳动力队伍的稳定。因此必须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出发,以城乡一体化为抓手,以富裕农民为基准,推进粮食生产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构建粮食生产的内生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弱质化、兼业化和粗放化问题,确保粮食安全。

第七章 新型城镇化、主销区粮食自给底线与能力安全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经济发达而耕地稀少、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粮食主销区已经不具备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农村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向城镇务工已是事实。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外流后,主销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对农户收入增长和粮食获得能力提高做出了贡献。目前粮食主销区已经呈现拉尼斯—费景汉(Ranis&Fei)的“粮食短缺点”现象,需要新的人力资本、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创新等要素流入。因此,目前在加大规模种粮补贴力度和基础设施投入同时,应加强新型农村劳动力主体培育和培训,加快先进技术应用和创新经营方式,促进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产出效率,逐步实现“粮食短缺点”向“商业化点”的过渡和重合。同时,主销区粮食在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发挥比较利益原则通过粮食区际调入和适当进口,促进区域间粮食购销合作和农业区域结构的优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总福利。在粮食库存、进口和产量三者齐升的情况下,主销区一味追求过高的粮食自给率不利于其发挥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粮食的有效供给更为重要,调整粮食产出结构,即粮食供给侧调整。需要注重调整粮食产出结构,保护粮食生产能力,从而实现粮食能力安全。

第八章 功能分工、区域互补与要素对流、均衡改进的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从粮食主产区的视角出发,主要研究功能分工与粮食效率安全;去小农化;从粮食主销区视角,重点研究区域互补与粮食能力安全;此消彼长。并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阐明要素替代与对流的均衡改进,以及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提出了制度安排的具体措施: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主销区市场秩序的建立、粮食生产能力和效率安全的支持保障、稀缺要素替代节约和生产率提高、农村新生代人力资本与新型主体的培育与投入,实现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的协同发展。主要解决区域互补与粮食市场安全问题。

中央一号文件从 2004 年起连续十二年锁定“三农”,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于粮食生产本身的弱质性和公共产品性,主产区种植粮食比较效益始终很低,主产区农民很难通过粮食生产而增加收入。而粮食主销区农户靠从事非粮产业反而获得了更高收入,从而提高了粮食获得能力。因此,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安排,建立粮食生产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实现分工合作和利益共享。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视角立足于粮食主销区,从公共管理和劳动经济学两门学科的交叉角度出发,研究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过程中达到“生产”和“获得”意义上的粮食安全协同,把农村劳动力问题与粮食安全问题结合的专题研究是一种创新。其次,本研究把比较利益学说理论创新地运用于地区间粮食资源合理配置、劳动力转移、粮食生产和交换研究,分析了“粮食短缺点”向“商业化点”移动过程引发的新问题,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实现粮食安全应采取“要素对流”和“要素替代”的新观点。第三,本研究在计量实证方面把主销区 6 个省、直辖市(未包含海南)和主产区 13 省(自治区)的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应用格里克斯(Griliches, 1963)提出的生产函数方法,修正与分析了常规变量与非常规变量对主销区粮食产出弹性的影响,测算比较了主销区粮食比较优势指数,以上这些分区域的估计与测算都是创新的。第四,研究综合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描述性分析与定量性研究并重,修正了全要素生产函数增长模型,比较和分析了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固定和随机两种效用模型,测算了主销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粮食生产的贡献。基于劳动力“异质性”假定,解决农业劳动力数据采集问题引起的“内部逻辑”难以一致的问题,通过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提出研究模型、协同发展模式和相应对策。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4)
第三节 研究路径和方法	(6)
第二章 理论分析与文献研究综述	(11)
第一节 劳动力流动的经典理论与模型综述	(11)
第二节 粮食安全问题的理论综述	(19)
第三节 劳动力流动、就业结构与粮食安全	(23)
第四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27)
第三章 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农村劳动力外流演变与粮食安全 ...	(31)
第一节 粮食管理制度变迁与农村劳动力外流演变	(31)
第二节 粮食生产弱质性、比较利益与农村劳动力结构变迁	(38)
第三节 地区禀赋差异与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5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56)
第四章 粮食主产区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外流与效率安全	(58)
第一节 粮食主产区的自然禀赋与比较优势	(59)
第二节 影响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分解	(71)
第三节 农村劳动力外流影响粮食生产的实证处理	(77)
第四节 本章小结	(81)

第五章 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粮食生产底线与能力安全	(83)
第一节 主销区粮食自给底线与劳动力外流	(83)
第二节 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生产的关联分析	(94)
第三节 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的“能力安全” ——以浙江为例	(100)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09)
第六章 农村劳动力外流、区域差异与粮食生产	(111)
第一节 文献回顾	(113)
第二节 我国农村劳动力外流和粮食生产	(115)
第三节 模型、变量与数据描述	(121)
第四节 实证研究结果	(122)
第五节 结论与政策建议	(128)
第七章 新型城镇化、主销区粮食自给底线与能力安全	(132)
第一节 相关文献综述	(133)
第二节 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获得能力	(134)
第三节 主销区农户选择、自给底线与粮食产能安全	(137)
第四节 结 语	(140)
第八章 功能分工、区域互补与要素对流、均衡改进的制度安排	(142)
第一节 功能分工与粮食效率安全:去小农化	(145)
第二节 区域互补与粮食能力安全:此消彼长	(146)
第三节 要素替代与对流的均衡改进	(150)
第四节 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协同的制度安排	(15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57)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159)
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结论	(160)
第二节 进一步研究方向	(164)
参考文献	(169)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目的

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放松了对农民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农业经营制度的改革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可能。但这也使得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分割制度约束,农村劳动力不能正常转移而出现了剩余显性化。随着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演进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村劳动力数以亿计转移,农村传统的“过密型”劳动生产方式已渐渐“去内卷化”,不少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种粮劳动力等投入减少。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粮食产区已转变为粮食销区(如浙江杭嘉湖),粮食自产水平下降,弃耕从事非农产业成为普遍现象。我国 1982 年的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加上之后的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工农城乡关系,这 5 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围绕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从时隔十八年后的 2004 年第六个中央一号文件开始,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加大减税力度着力建立农民减负长效机制、推动新农村和建设现代化、稳粮增收、统筹城乡发展和建立新型农村经营体系,到 2014 年的开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和 2015 年的创新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第二阶段连续十二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都围绕农业、稳粮增收与安全问题,有梯度地减轻农民负担和提高农民收入,深化农村改革。201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城

乡资源要素流动加速、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要挖掘潜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实现稳粮提质和增收增效,完善和落实粮食省长负责制。因此,如何通过“要素对流”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粮食安全协同,通过“要素替代”探索新型粮食生产嵌入主体,提高粮食边际产出能力,清晰政府作用边界,开辟新途径优化农业结构,寻求新突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些都是人口由农村到城市转移过程中,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实现富裕农民、城乡共同繁荣所需解决和研究的公共管理问题,破解这些难题也是“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

由于粮食的特殊性,国家始终对稳定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很重视。回顾中央一号文件,可以将其分为1982—1986年和2004—2015年这两个时段进行考察,我国农业政策和粮食管理制度变迁都是供给主导型政策与制度演变,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第一阶段于1985年统购统销制度解体开始,先改“购”,即“逐步缩小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价”。第二阶段重点是购销体制的转轨,先改“购”,后改“销”,再“购销”同改,实行“稳一块、活一块”的粮食购销“双轨制”,直至最后放开市场的渐进式改革。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也由计划经济时期禁锢在农村,到改革开放后慢慢放开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管制也伴随着粮食管理体制的变迁而逐步放松。相对于粮食管理制度变迁带有强制性正式制度变迁特性,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家庭联产承包制等粮食生产制度变迁,是诱致性非正式制度作用的过程,也是帕雷托改善的过程。速水佑次郎(1986)指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忽视粮食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是表现为粮食问题优先。粮食等农产品经营制度改革和农村劳动力再配置,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粮食生产制度的变迁慢慢启动,转移数量在2005年前是高峰,从2010年开始回落。而我国的粮食产量总体呈“V”形上升趋势,2005年前后有探底,之后又拉升,到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十二连增”。但与此同时,出现的悖论现象是,粮食总产量和库存量上升的同时,进口量也同增。2014年谷物进口1951万吨,同比增长33.8%,2015年谷物共进口3271.5万吨,同比增长67.6%,2016年谷物进口虽然同比减少32.8%,但仍达2199.7万吨。由于价格和运费的双重下降,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进口规模,并且多数进口粮食市场集中度较高,如玉米和大豆进口依赖美国,大小麦进口分别依赖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稻米进口主要依赖泰国,存在高度的依赖关系。尤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高新技

术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第二、三产业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仍然非常注重粮食生产,重视保护农民利益和粮食生产能力,每年大量出口粮食到发展中国家,其中,玉米和大豆出口占世界份额很大。我国适当利用国际市场有助于平衡年度间的供应,有利于加强粮食安全。但出现粮食产量、库存量和进口量同增是悖论。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减少农民向城市转移量才能富裕农民。立足于新的粮食安全观提出降低粮食自给率,将部分粮食的供应转由国际市场来弥补,将粮食生产能力安全转移到国际市场,需要研究如何根据我国粮食进出口的依赖关系确定安全度,即界定我国粮食生产自给底线。201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1623.9万吨,比2015年减少0.8%,这是十三年来我国粮食产量首次下降,与种植面积和单产下降有关。改变过去单纯追求粮食高产转向注重质量,即以高效益转到高产目标,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竞争力,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需要。

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过程,也是农户家庭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过程。青壮年或知识技能者优先离开农村到城市,而留在农村的种粮务农劳动力基本上是老人和妇孺,所谓的“386199”(妇女儿童老人)队伍。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得农户家庭重新配置人力资源,许多农村已经成为老弱病残的聚集地(或称空心村),种粮务农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具有相对人力资本优势的劳动力大量外流,也意味着粮食作业中高人力资本的流失,农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型粮食经营主体和科技等“要素流入”,没有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安排,农村劳动力边际产出与粮食边际产量面临着低产出率和低效率。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世代交替需要很长时间,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往往成为“两栖人口”,原本由低成本的农村适龄劳动力构成的粮食生产人口红利和由资本匮乏构成的收益率红利逐渐减少。

“粮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农业问题。”(速水佑次郎,1986)。按照自然禀赋和比较利益原则,我国分为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平衡区,粮食问题在不同区域具体表现不同。如何提高产出效率和维持可持续性高效率生产是主产区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实现能力安全是主销区面临的主要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生产、流通、交易和消费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多从全国层面强调粮食数量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1974)关于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的定义包含了两个重要维度,即“供给能力”和“获得能力”,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外出打工增加收入,从而可提高从市场获得粮食需要的能力;另一方面,外出

打工本身减少了其粮食自给能力,从而影响供给能力。实证测算发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度发生了变化,大大低于林毅夫测算的 1992 年后的贡献度,并且表现为区域性差异,因此,需要根据自然禀赋和比较利益原则,分析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区域分工和合作;从粮食的供给和获得能力两个主要维度出发,做出农村劳动力外流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的制度安排,减少交易费用、明晰政府行为的作用边界。揭示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的研究,对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粮食产出效率的提高、农民利益问题的调整、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的保障等可提供政策支撑,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科学的参考。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本研究在厘清我国粮食管理体制变迁的基础上,遵循比较利益和自然禀赋原则,分区域即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同影响,研究农村户籍制度演变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以及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实质上是劳动力从农村外流到非粮产业和非农产业的过程,因此,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研究农村劳动力外流问题。本研究时间是改革开放至今。我们选取实证模型分析的时间跨度以 1978 年改革开放到 2008 年为主,原因是这段时间跨度内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具有代表性和时代特征意义。考察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安排对粮食产出的贡献率及其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制度安排和影响,如生产函数新内涵和要素替代与对流的制度安排、区域不同分工问题以及阿马蒂亚·森的可能性自由选择问题等,研究的理论与应用价值体现如下。

1. 丰富了粮食安全理论

本研究揭示了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提出了粮食安全不仅是数量安全,更是效率安全与能力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界定,在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粮食安全不仅是指数量安全,更要强调效率安全和能力安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然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粮食是密集型产品,粮食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

致,属于低附加值弱势产业。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可以缓解粮食生产的过密化、内卷化生产现象。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粮食生产主体的更新和新要素的组合,因此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目前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后,粮食生产也随之大量兼业化和副业化,转移的劳动力甚至出现了不重返性现象。与此同时,农户选择非粮生产也带来了粮食能力安全的实现。2015年颁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我国有18亿亩耕地,其中承包的农户有2.3亿亩,农民户均种地不到10亩,规模经济和规模效应都没有体现,农地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成为新方向。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从粮食生产密集要素投入过度到要素效率的提升,再到创新驱动的新发展,需要通过经营主体创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让务农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成为主动的自愿选择;通过农地有序托管和流转,带动适度规模经营。因此,这些新问题和新内容的进一步研究,丰富了粮食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 探索产出增长与新要素组合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是农村家庭劳动力重新配置过程,需要有“要素替代”与“要素对流”的制度安排。不同时期的要素投入和农村劳动力外流情况均不同,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和索洛(Solow)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K)和劳动(L)要素对粮食产出的贡献随着劳动力的外转移而变化,需要有新的要素流入并替代。本研究将在测定现有劳动、资本和制度等因素对粮食产出的贡献基础上,研究“要素替代”长期生产函数与新要素组合模式,以提高粮食边际生产率;研究最优劳动投入量,确立新内涵的生产函数;研究农村劳动力要素流出的同时,分析新型主体、资本与技术等新要素流入方式;重视农业生产技术要素(A)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对增加产出的重要影响,即索洛余值。生产函数决定生产可能性边界,农村劳动力外流需要农村人力资本资源重新配置,即改变原有粗放增长方式,提高效率(TFP),改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费 and 拉尼斯(Fei & Ranis, 1964)“粮食短缺点”向“商业化点”的过渡。

3. 实现区域合作兼顾平衡

根据自然禀赋和比较利益原则,粮食生产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本研究对相关理论和制度变迁进行了综述和梳理,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分别测算粮食综合比较优势,实证分析了制度等因素的边际效应和

影响变化问题,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不同区域的粮食产出贡献率变化与差异问题,这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实现粮食安全意义重大。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在不同的区域的表现和侧重点不同:主产区主要表现为粮食的边际产出效率和可持续生产问题;主销区主要表现为市场调入和获得能力问题。根据自然禀赋与比较利益原则,以及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观点,主销区兼顾平衡,从国内外市场适量换取耕地密集型的粮食产品,是一种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能力,可实现功能分工和区域互补,粮食获得能力安全可防止粮食安全问题产生的溢出效应,有效进行供给侧改革。

4. 界定政府和市场行为的边界

城镇化和粮食市场化需要政府更加重视可能由此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实现交易费用相对节约的同时确保粮食安全。粮食等大宗产品是公共产品,其生产与储备具有保障国家安全的公共服务性功能。政府适度干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缺陷,例如我国粮食生产连续十二年不断增长,库存也随之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过程中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国家为了保障农民的合理收益,不断适当提高临时收储价和最低收购价。但由于国际粮食价格下跌,因此,政府干预也可能引发政府失效。国内粮食品种供给和价格问题也是进口粮食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因此,应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边界,从国民经济发展循环的社会安全视角看待问题:用补需方的方式提供补助,把粮食价格与补贴分开,适当实行直接补贴农民政策,以补偿正外部性和达到最低经济规模;找到一个让种粮农民的务农收入不低于外面打工收入的均衡点,甚至不低于当地的城镇居民收入,让种粮成为人们的自愿选择;探讨经济转型、城乡一体化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调动财政、社会资金投向“三农”。本研究旨在明晰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建立动态粮食安全长效机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第三节 研究路径和方法

1. 研究路径

本研究的研究路径是:从我国粮食自然禀赋和比较利益出发,研究不同区域的粮食安全问题,背景是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即劳动力从农村外流。本研究遇到的挑战如下:一是怎样实现劳动力流动理论与粮食安全理论有